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

陈彦斌 姚一旻

[摘要]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在基准情形下，预计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平均潜在经济增速较 2000~2010 年将分别下滑 2.3 和 4 个百分点。造成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总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较强“增长依赖症”的情况下，经济增速的显著降低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同时经济增速放缓也会造成社会精英的大量流失。应该从两方面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一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的动力逐渐衰减的过程中及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二是积极推进社会改革以降低社会稳定对高增长的依赖。

[关键词] 经济增长；增长核算；增长依赖症；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改革

[作者简介]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一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1 年平均经济增速高达 9.98%。中国 GDP 总量世界排名由 1978 年的第 10 位跃居至 2010 年的第 2 位，占世界 GDP 比重由 1980 年的 1.9% 稳步升至 2010 年的 9.4%。^①

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08~2011 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比 2000~2007 年降低了 0.9 个百分点，也比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的长期均值低 0.38 个百分点。2012 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进一步延续了下滑趋势，同比经济增速为 7.6%，创下自 2009 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大幅低于 2000 年以来的季度经济增速均值达 2.3 个百分点。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中速增长阶段的新时期（世界银行，2012 等）。^②那么，未来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如何？原因是什么？将带来怎样的挑战？应该如何应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使中国顺利进入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的新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使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当前特征和未来走势。增长核算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和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主要方法，其突出优势是可以通过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经济增长动力的明确计算和分析来深入考察经济增长问题。在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预测之后，本文进一步从出口、投资、生产成本、TFP 和政府作用五个方面解释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然后从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应对策略。

二、经济增速放缓：当前特征与未来趋势

1、经济增速放缓的当前特征

本小节使用增长核算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当前特征。计算方法同陈彦斌等（2010），^③即采用标准的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 TFP 四个方面。^④计算结果（表 1）表明，当前经济增长放缓是由劳动力和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70973129）；“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① 数据来自 IMF 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 年 4 月）。

^② 具体生产函数为 $Y_t = A_t K_t^\alpha (E_t L_t)^\beta$ ，其中 Y 是总产出（GDP）， K 是总资本存量， E 是人力资本（教育）

TFP 这两种增长要素的大幅衰减所导致的。2008~2010 年劳动力和 TFP 平均增速分别是 0.36%和-0.73%，较 2000~2007 年分别下降了 0.33 和 3.5 个百分点，也比 1979 年以来的长期均值低 1.5 和 3.1 个百分点。

此外，如果排除政府所采取的超常刺激政策的影响，当前经济体自发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降低。增长核算结果显示，当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超常增长而驱动的，2008~2010 年资本增速达到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的 19.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97%。而资本的超常增长主要源自于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在 2008 年底推出的 4 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其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2009 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远高于以往正常水平的历史最高峰 33.2%，相比之下 1981~2010 年的平均增速仅为 15.7%；2010 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 19.2%的历史高位。可以推断，当前经济体自发的投资增速必然会大幅低于实际观测值，这意味着当前自发的经济增速也会明显低于实际观测值。

表 1：增长核算（单位：%）

指标	变量	总时间段	子时间段			
		1979~2010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07	2008~2010
年均增速	GDP	9.95	9.54	10	10.51	9.76
年均增速 (贡献率)	资本	11.68 (59.3)	8.29 (45.3)	11.06 (58)	14.22 (65.9)	19.38 (97)
	劳动力	1.82 (10.9)	3.52 (21.2)	1.31 (8.3)	0.67 (3.5)	0.36 (1.8)
	人力资本	1.76 (11.4)	3.29 (22.1)	0.83 (5.8)	0.83 (4.6)	1.69 (8.8)
	TFP	2.4 (18.1)	1.95 (10.7)	3.5 (27.8)	2.81 (25.9)	-0.73 (-7.6)

2、经济增速放缓的未来趋势

本节将对中国“十二五”（2011~2015）和“十三五”（2016~2020）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预测方法是：首先使用类似于 Perkins and Rawsk（2008）、Lee and Hong（2010）和 Wilson and Stupnytska（2007）^{[3][4][5]}的增长核算预测框架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分解为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 TFP 这四方面增长动力的预测，之后借鉴 Perkins and Rawsk（2008）、Maddison（2007）和张延群等（2009）^{[3][6][7]}的预测思想，分析决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 TFP 历史运动轨迹的主要因素在未来将发生何种变化，从而预测其未来走势对于历史运动轨迹的偏离。

按照我们关于未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 TFP 变化趋势的判断，将未来中国经济的基准情形设定如下：^{①②}（1）中国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将会终止，资本增速将逐渐回落至长期均值水平：资本存量增速将在“十二五”时期由 2000~2010 年间的平均 15.62%

存量， L 是劳动力存量， A 度量除了资本、人力资本、劳动之外所有对总产出有影响的因素， α 和 β 分别度量资本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的产出弹性。

^① 未来各变量的预测值是根据与过去时期的对比来确定的，Wilson and Stupnytska（2007）^[5]认为应该将这种预测理解为在一系列关于未来的合理假设之下考察经济体的表现。对于预测数值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我们认同 Perkins and Rawsk（2008）^[3]的看法，即：对于一个基于好的模型（如增长核算模型）所作出的预测，即使其得出的预测结果是完全错误的，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决定未来经济走势的机制的理解，而且还可以为未来的研究者理解实际经济增速偏离预测值的原因以及进一步改进预测模型提供基准。

^② 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本文在预测时主要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不考虑短期冲击的影响，因此将潜在增长率作为分析和预测的对象。预测中所使用的就业、人力资本和 TFP 指标也都是相应的 HP 滤波之后的趋势值。

下滑至 1990~1999 年间的 11.06%，并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下滑至 1979~1989 年间的 8.29%。

(2) 未来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与联合国 (2010) 所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同 (相当于假设未来的趋势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 即潜在就业人数增速由 2010 年的 0.82% 逐步下降至 2020 年的 -0.21%。(3) 假设人力资本存量 (趋势值) 将延续 1990~2010 时期的变化趋势, “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较其上个时期^①下降 0.075 个百分点, 分别达到 0.73% 和 0.65%。(4) TFP (趋势值) 增速在 2000~2010 年已经大幅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 2.2%, 未来预计难以出现明显改观; 再考虑到未来中国仍然属于赶超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TFP 增速进一步显著下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假设 2011~2020 年间的 TFP 增速将保持在 2.2%, 这接近于 Lee and Hong (2010) 和 Kuijs (2009) 对同时期 TFP 增速所作的预测 (分别是 2.3% 和 2.36%)。^{[4][8]}

此外, 我们也设定了偏离基准情形的悲观情形和乐观情形, 以考察未来经济增速的下界和上界。^②基于对各种情形的设定, 使用与陈彦斌等 (2010)^[2]相同的核算公式可以得到, ^③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平均经济增速将分别位于区间 7.41%~9.49% 和 5.39%~7.8%, 基准情形下的潜在增速分别是 8.23% 和 6.5% (表 2)。本文的预测结果在已有研究所显示的预测区间之内: 与世界银行 (2012)、Kuijs (2009) 和张延群等 (2009)^{[1][8][7]}所作的预测比较接近; 较之 Wilson and Stupnytska (2007)、Maddison (2007)、Lee and Hong (2010)、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 (2011)^{[5][6][4][9]}的预测更加乐观, 而相对于 Fogel (2007)^[10]的预测结果则更加悲观 (详见表 3)。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发现,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 未来经济增速将出现大幅下滑: 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 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较 2000~2010 年分别下滑 2.3 和 4 个百分点。即使是在较为乐观的情形下,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速也将分别下滑 1.1 和 2.7 个百分点; 而如果在较为悲观的情形下, 则下滑幅度将分别高达 3.1 和 5.2 个百分点。

表 2: 2011~2020 年潜在 GDP 增速预测 (单位: %)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10	预测					
				2011~2015			2016~2020		
				基准	悲观	乐观	基准	悲观	乐观
潜在 GDP	9.68	9.69	10.54	8.23	7.41	9.49	6.5	5.39	7.8
资本	8.29	11.06	15.62	11.06	10.06	12.06	8.29	7.29	9.29
潜在劳动力	3.45	1.41	0.61	0.52	0.47	0.52	-0.14	-0.19	-0.14
人力资本 (趋势值)	2.74	0.96	0.8	0.73	0.73	1.52	0.65	0.65	1.52
TFP (趋势值)	2.47	3.09	2.2	2.2	1.9	2.57	2.2	1.6	2.57

^① “上个时期”的具体含义是: 2000~2010 的上个时期是 1990~1999, “十二五”的上个时期是 2000~2010, “十三五”的上个时期是指“十二五”, 以下同。

^② 悲观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差别是: (1) 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下降 1 个百分点。(2) 每年的潜在就业人数增速较基准情形下降 0.05 个百分点。(3) TFP 增速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延续 1979~1999 年 和 2000~2010 年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趋势, 即年平均增速较上个时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乐观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差别是: (1) 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提高 1 个百分点。(2) 人力资本增速和 TFP 增速都可以保持 1979~2010 年的平均增速。

^③ 计算公式是: $dY_t/Y_t = dA_t/A_t + \alpha dK_t/K_t + (1-\alpha)(dE_t/E_t + dL_t/L_t)$, 其中 Y 是总产出 (GDP), K 是资本存量, E 是人力资本存量, L 是劳动力数量, A 是 TFP, α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 (本文的估计值是 0.4874)。

表 3：一些代表性研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测

研究者	预测期间	预测值 (%)
世界银行 (2012)	2011~2015	8.6
	2016~2020	7
Eichengreen, Park and Shin (2011)	2011~2020	6.1~7
	2021~2030	5~6.2
Lee and Hong(2010)	2011~2020	6.09 (基准情形) 或 7 (改革情形)
张延群、娄峰 (2009)	2011~2015	8.3
	2016~2020	6.7
Kuijs (2009)	2010~2015	8.4
	2016~2020	7
Perkins and Rawski (2008)	2006~2015	6~8
	2016~2025	5~7
Maddison (2007)	2003~2030	4.98
Fogel (2007)	2000~2040	8.4
Wilson and Stupnytska (2007)	2006~2015	7.7
	2015~2020	5.4

三、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本节从三重视角分析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首先，从需求视角分析长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从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和 TFP 等供给面因素进行分析；最后，从政府的视角分析未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1、出口增速由于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以及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而大幅下滑。当前中国出口形势出现严重恶化：出口增速由 2000~2007 年的 24.8% 降至 2008~2010 年的 6.5%，大幅下降了 18.3 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相应由 10.5% 下降至 -6.9%，大幅下降了 17.4 个百分点。预计在未来出口疲软的状态仍将持续。造成出口增速下滑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从根本上降低全球潜在经济增速，抑制中国外部需求的扩大。上世纪后半段，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使得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一轮长波经济增长的繁荣期；经济繁荣促使世界市场上消费旺盛，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需环境。而在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束，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①致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世界技术创新难以出现飞跃式、突破性进展，世界经济将步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漫长过程。

第二，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增速将趋于降低。欧盟和美国长期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贸易伙伴；而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严峻的债务问题将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不会再保持以往的快速增长，中国难以再依赖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来实现出口的高增长。

^① 一般来说，在技术革命刚刚出现时，技术创新的“蜂聚”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目前还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OECD 专利技术申请数量增长率从 1998 年左右就基本处于下滑趋势，而且从 2007 年开始连续出现负增长；各技术领域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在新世纪以后大幅度下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1）。^[11]

一是发达国家居民部门的还债压力使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下滑，减少了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①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因此居民部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会处于重建储蓄和积累财产以偿还债务的阶段（例如，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从 2000~2007 年的平均 2.8% 上升到 2011 年的 4.7% 和 2012 年一季度的 3.9%^②），致使以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无法持续，消费陷入疲软。

二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债务困境将对出口增长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当前欧洲是政府债务困境的重灾区，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境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1 等）；^[11]据 IMF 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1~2017 年都将处于历史高位。^③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困境将加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抑制中国出口增长；政府债务困境将迫使发达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直接降低了总需求规模；同时高政府债务还限制了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能力；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困境将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增大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

第三，当前中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在当前已经具有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根据 Guo and N'Diaye (2009) ^[12] 的计算，当前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在 10% 左右，即使中国未来的实际出口增速保持于中等水平（平均约 15%），那么在 2020 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将高达约 15%；而对于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占世界市场份额的峰值也仅为 10% 左右。可见，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出口规模，未来出口规模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将可能接近世界市场吸收能力的上限，是国外需求所难以消化的，而且国际贸易市场中竞争的显著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大幅增多等诸多限制因素也将会随之出现。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持续，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

2、投资增速将由于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明显收窄、投资效率出现恶化趋势和“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消失而显著放缓。改革开放以来，高投资增速促使中国资本得以快速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1979-2009 年间中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速高达 12.24%，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4 倍多。而在未来，中国投资增速将出现显著放缓，主要原因是：

第一，当前中国工业化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明显收窄，继续通过提高工业化程度来推动投资的模式难以为继。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 2007 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 1970 年以来的峰值，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有限。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 15 至 20 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9）。^[13]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 1978 年起至今已超过 30 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 1991 年起至今也走过了 20 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不大。

第二，当前中国投资效率出现恶化趋势，低效率投资所带来的低回报将阻碍投资的增加。以投资和增量产出之比计算得到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又称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是反映投资效率的一个有效指标，该指标反映了一单位的 GDP 增量需要多少单位的投资来拉动。增

^① 此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消费不振所导致的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等问题，也必然更多地采取鼓励出口和抑制进口的措施调整其外部不平衡。

^② 数据是根据月度数据计算的平均值。

^③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 年 4 月）。

量资本产出率越高，意味着投资效率越低。该比率的国际平均水平是 2，而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始终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从 1992 年的 2.4 稳步提高到 2007 年的 4.2。当前该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资增速而猛增到 2008 年的 6.26、2009 年创纪录的 7.8 和 2010 年的 7.3。由此可见，中国当前投资效率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投资的低回报导致了低投资收益，必然会阻碍投资的增加。

第三，“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消失使得投资收益降低，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需求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高储蓄所带来的国内消费不足问题，缓解了国内消费不足对投资增长的制约，形成了由外部需求消化生产能力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而在未来，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将使中国很难延续这一发展模式。

3、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储蓄率的高位回落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严重降低而不复存在。

第一，劳动力成本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显著提高。有利的生产型人口结构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压低了劳动力成本。而在当前，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结构步入拐点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速的迅速减小带动劳动力成本进入了长期上升通道：根据联合国（2010）的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当前快速提高，并将于 2018 年达到自 1950 年以来的最大值 5.44%；这导致劳动年龄人口（15 至 64 岁）增长率将会由 2010 年的 0.9% 下降到 2016 年的 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

第二，利率将由于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趋于升高。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压低了金融市场整体利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国际对比可见，过去 30 年中国实际贷款利率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于低水平：1980~2010 年中国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1 至 6 个百分点。

而在未来，储蓄率将由高位回落，进而带动实际利率上升。具体而言，未来国民储蓄中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都将趋于降低。引起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屋价格上涨幅度将逐步趋缓，为买房而储蓄的压力可能会削弱；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金融深化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新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信用卡等新消费模式的普及。政府储蓄将存在较大的下降压力：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已经处于高位，财政收入难以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却可能由于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其他民生支出的扩大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未来劳动报酬、企业支付的财产收入净额等企业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储蓄。

第三，资源环境成本由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严重降低而显著提高。中国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资源的高消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致使当前和未来面临资源品紧缺和环境恶化问题。^①资源品供给能力的严重削弱会推高资源品价格，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民对生活环境越来越高的要求也会显著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强调减少污染，这就需要应用施加额外环保要求的生产技术；二是通过加大对已经造成的污染的治理，这需要政府加强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税费征收。

4、TFP 增速由于制度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而显著下降。

第一，当前制度红利由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大幅提升而步入较长期

^①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的数据，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预计在 2020 年，我国 45 种主要矿产中的 19 种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同时，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也已经迅速恶化：例如，2010 年的较清洁海域面积比 2003 年减少了 47.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排名由 1990 年的 88 位上升至 2008 年的 77 位（数据来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的衰减阶段。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而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是决定当代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中国市场化指数在 1981~1999 年的平均增速是 13.7%，进入 21 世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 5% 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未来预计也难以改观。^①

究其原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基本遵循“由易到难、由经到政”的路径，前期相对简单、低成本的改革已经走完浅水区，但如何走完深水区仍是未知数。一是政府在改革中的尴尬角色是未来改革的一大阻力。与前期的改革相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仍将由权威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则正是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自利性的政府人员必然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分享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利益，不愿意退出市场。可见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面临来自改革主导者自身的威胁（张孝德，2011）。^[14]二是当前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希望将过渡性体制长期化而反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因此进一步改革需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及大量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必然面临更高的难度和风险。

第二，当前技术进步出现放缓，未来也难以出现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有利转变，中国的技术水平从一个低起点开始起步，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而在当前，技术进步趋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 1990~1999 年的 14.3% 大幅下降至 2000~2007 年的 7.9%，^②而且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也将长期持续。

技术进步放缓的原因有三。一是前文所述的世界性技术进步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谷。二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能力由于追赶潜力的减弱而明显减小。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技术发展的追赶阶段，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是获取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而吸收能力基本上和追赶潜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差距）成正比。中国当前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和经济差距较之以往已经大幅缩小，这就意味着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变得更加困难（冯玉明，2007）。^[15]三是当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未来可能也难以获得显著提高。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技术追赶阶段的后期，并在未来将进一步向世界技术前沿靠近，因此自主创新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冯玉明，2007；郭熙保等，2007）。^{[15][16]}然而当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设备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如电子信息领域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 80%。^③自主创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私营企业而非政府规划和干预，因此当前和未来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加依赖于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私营企业实力的壮大（世界银行，2012）。^[1]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政府很可能仍然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5、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强烈意愿的驱动下，运用其强大能力通过推动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烈意愿来自于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的根本，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的有力保障。在推动经济增长强烈意愿的驱动下，权威政府运用其强大能力推动投资扩张：一是政府通过运用对资金、土地、矿产、能源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支配权降低了企业的各种投资成本；二是政府经常同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便地刺激投资增长。

^① 数据来自陈彦斌等（2010）。^[2]

^② 同上。

^③ 数据来自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0/c_122059853.htm。

而在未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未来严峻的民生问题无法再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政府工作的重心将因此由推动经济增长向社会建设等民生领域转移。同时，市场化改革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政府对于金融市场、资源品市场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将可能在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所减弱。

四、经济增速放缓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确实有助于缓解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经济增速放缓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1、我国经济与社会已经长期适应高速增长并形成“高增长依赖症”，即经济增长成为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方式，因此经济增速明显的趋势性放缓将严重削弱社会的稳定性，这就是“不断做大的蛋糕不能继续做大的后果”。

第一，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仍将处于低水平，为了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长期以来总体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79~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是0.34；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则分别下降至0.1和0.05。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等因素是决定就业弹性走势的主要原因（陆铭等，2011），^[17]而这些因素在中短期内都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未来就业弹性也将基本保持于低水平。

在低就业弹性背景下，当前和未来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求较高的经济增速。尽管劳动人口增速在当前和未来明显下降，但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这是由于新增大学毕业生人数仍将保持于高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仍然突出。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生总数为212万，随后屡创新高，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660万，未来也难以出现大幅下降。此外，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将淘汰掉一大批使用落后生产技术的企业，带来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人员，这些失业的员工对新技术缺乏了解，即使是在全国范围的“技工荒”逐步扩大的总体态势下也难以实现顺利就业。

第二，在社会建设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通过高速增长改善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主要途径。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没有充分地发挥其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遏制社会失序等功能。社会建设不足严重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和对社会的满意度，大幅提高了社会动荡风险。如果社会建设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只能通过快速提高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缓解其对于解决社会建设领域深层次矛盾的迫切程度。可见高居民收入增速对于中国是非常必要的，而这就要求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

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改观，因此只有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才能使居民部门总体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中国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都有显著上升（杨天宇，2012）。^[18]这一现象植根于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和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等深层次因素（白重恩等，2009），^[19]未来中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不但难以改观，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中国难以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增速，而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才能使居民部门获得较快的收入增长。

此外，在当前和未来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了快速提高受社会建设不足影响尤其严重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也需要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变为当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①严峻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社会建设滞后所导致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在未来分配制度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就无法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而只能通过较高的经济增速把可供分配的总收入迅速做大。

第三，严峻的民生压力需要财政支出快速增长，进而要求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以获取相应的财政收入。在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既需要解决以往由于社会建设不足而长期积累下来的住房、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等重大民生问题，也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所带来的民生压力，因此财政支出将保持快速增长。这必然要求相应增加财政收入，在中国政府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加无法依靠税率的提高，而只能主要依靠经济增长。

2、宏观调控治理短期经济衰退的能力趋于减弱，经济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将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在发生负面冲击时，将出现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短期经济衰退。在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基础上，实际经济增速在负面冲击下的进一步下降可能导致短期经济增速过低的“阵痛”，进而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危机；这使得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来促使经济缓慢地调整至均衡状态，而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迅速刺激经济恢复。然而“增长放缓和通胀压力高企并存”可能是未来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必须考虑通胀问题；这将削弱宏观调控政策治理短期经济衰退的能力，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速的趋势性放缓将带来更大的社会稳定风险。

第一，未来通胀的形成机制将可能发生显著变异，通胀率的长期均值将出现系统性提高，未来经济将可能长期呈现“增长放缓和通胀压力高企并存”的特征。中国未来将面临较大的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农产品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在未来可能都趋于上涨。过去有效抑制通胀发生的因素（货币深化和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可能也将出现逆转。综合来看，未来经济将可能长期呈现“增长放缓和通胀压力高企并存”的特征。事实上，这一特征在2011年已经初步显现：2011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2%，CPI同比提高5.4%，而2009年和2010年这两个指标则分别为9.2%、-0.7%以及10.4%、3.3%。

第二，通胀会给中国居民家庭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尤其会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是在当前中国的居民家庭财产积累水平与结构特征下，通胀会给中国居民家庭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当前中国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提高，而财产结构依然以名义资产为主，^②抗通胀能力仍然停留在低水平。因此，通胀将给中国居民部门造成大量的财产缩水，大幅降低社会福利。根据肖争艳等（2012）^[21]的计算，当前持续10年5%通胀下的居民财产缩水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平均为1.8%，与持续10年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成本之比高达32.9%。二是未来中国通胀将可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农产品资本化倾向加剧等因素的作用而仍以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为特征；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比相对更高，因而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三是相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富人的资产持有结构更为多元化且实际资产占比更高，因此通胀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财产侵蚀更严重，从

^①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1）年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高达0.52，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

^② 具体数据详见肖争艳等（2011）。^[20]

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①

第三，在“保增长”和“控通胀”两大政策目标需要兼顾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治理短期经济衰退的能力将会被削弱。治理短期经济衰退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是以见效快的总需求管理为主（这也是中国以前惯用的“保增长”措施），而这种调控方式在未来将面临两难困境：如果采用扩张总需求的政策，那么虽然对“保增长”有所裨益，但是会进一步加大居于高位的通胀压力；相反，如果采用收缩总需求的政策，那么虽然将对“控通胀”起到效果，但是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宏观调控必须在“保增长”和“控通胀”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治理短期经济衰退的能力从而被严重削弱。

3、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精英流失，引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

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精英流失，以富裕人群和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第三次移民热潮可能正在形成。^②当前精英群体的流失源自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教育水平、法制环境、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显著差距。^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是留住和吸引精英群体的关键；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仍然远强于发达国家，仅有 16%的高净值人士^④是为了海外投资和业务发展便利而考虑移民，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移民的高净值人士仍然将其事业重心和相应资产留在国内以谋求发展。^⑤而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显著放缓，同时发达国家逐渐由金融危机的谷底进一步复苏，这将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速的差距，削弱中国经济对于精英群体的吸引力，加剧精英群体的流失。社会精英的流失意味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将对国家的发展前途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五、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压力所带来的挑战，应该着重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防止出现“硬着陆”。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降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

1、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再持续，为了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防止出现“硬着陆”，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增长动力逐渐衰减的过程中及时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扩大国内居民消费等途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行政体制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角色与定位的转型，即由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将重新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避免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促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由政府转移到企业和居民，建立起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其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避免由于政府的扭曲性政策而导致的低效

^① 具体数据详见肖争艳等（2011）。^[20]

^② 详见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和中国社科院 2010 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

^③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的数据，58%的高净值人群愿意进行投资移民的原因是改善子女的教育情况，43%的人是希望保障财富安全，32%的人是为养老做准备，16%的人是为了海外投资和业务发展便利。

^④ 不同研究机构对高净值的具体数值范围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指的个人净资产很高的富裕阶层。

^⑤ 《瞭望东方周刊》（2011），《南方日报》（2011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2-13/3526884_4.shtml）。

率投资和产业结构失衡；可以减少权力寻租、促进机会平等，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并刺激居民消费等。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第一，进行政府自身改革。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对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并改进和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提高审批透明度和效率。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改变以 GDP 为核心的相对目标考核体系，提高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监督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所占权重。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要将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大幅提高维护市场秩序、教育与培训、医疗卫生、环境治理、公共文化建设等公共服务性支出所占比重；此外，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为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

第二，进行要素市场改革。逐步推动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使其能够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成本。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减少金融市场扭曲。

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细化与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降低金融、铁路、能源等长期垄断性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强化市场竞争。

第四，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层面，未来应着重针对目前大型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严重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

2、积极推进社会改革以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降低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是导致中国出现社会架构的稳定性持续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性逐步增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缓解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弥补社会建设领域的历史欠账，降低社会对经济增速的依赖度。具体来说，应该从调整分配方式、扩大就业、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四个方面推进社会改革。

第一，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着力降低贫富差距。降低贫富差距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还有助于壮大社会中间阶层，强化社会的自主稳定功能。而且公平的分配方式本身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关键内容，能够增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应该在初次分配环节，健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重点提高普通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调控力度；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在二次分配环节，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在三次分配环节，进一步引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应通过引导房地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和房产税改革等手段调节居民财产分布，逐步改变财产持有严重不平等的格局。

第二，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就业是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居民接触社会的主要渠道、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扩大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应该深化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的就业体制障碍；结合结构性失业人员的特点，提供个性就业指导；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鼓励毕业生深入农村以及基层就业；鼓励自主创业，积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加快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

第三，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在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向全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和保障。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改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健康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

应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和行政问责；依据中央与地方管理责任的划分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缩小区域和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具有协调利益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可以使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加通畅、社会舆情的汇集和分析更加高效，还可以通过灵活和丰富的途径将矛盾及时化解于基层和萌芽。

应该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建设以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加强政府管理与基层自主管理的配合与互动；集中社会管理资源重点应对影响面大的社会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 [1] The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2012.
- [2] 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5）。
- [3] Perkins, D.H. and E. Rawski.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2025".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Rawski, 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 Lee, J. and K. Hong.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Determinants and Prospect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20, 2010, September.
- [5] Wilson, D. and A. Stupnytska. "The N-11: More Than an Acronym".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53, Goldman Sachs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2007.
- [6] Maddison, A.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张延群、娄峰：《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与预测：2008—2020年》，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
- [8] Kuijs, L.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World Bank China 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 2005.
- [9] Eichengreen, B., D. Park and K.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16919, 2011.
- [10] Fogel, R.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3184, 2007.
- [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复苏放缓、风险上扬与结构刚性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1。
- [12] Guo K. and P. N'Diaye. "Is China's Export-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 IMF working paper, WP/09/172, 2009.
- [1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9年第三季度）——次高速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2009。
- [14] 张孝德：《拐点转型与中国模式再创新》，载《经济研究参考》，2011（25）。
- [15] 冯玉明：《自主创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载《新华文摘》，2007（11）。
- [16] 郭熙保、肖利平：《技术转移、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方式转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4）。
- [17] 陆铭、欧海军：《高增长与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2011（12）。
- [18] 杨天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载《学习与探索》，2012（2）。
- [19]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
- [20] 肖争艳、程冬、戴轶群：《通货膨胀冲击的财产再分配效应——基于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6）。
- [21] 肖争艳、姚一旻：《中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Slowdown: Reasons, Challeng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CHEN Yanbin, YAO Y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down will continue in the future: in the baseline model, the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decline by 2.3 and 4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12th and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ompared to the 2000~2010 period. The reasons are: the growth rate of export and investment will slow down substantially; low-cost advantage will cease to exist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FP will decline; government's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may be weakened.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society still has strong "growth dependency syndrome" in the future, the large reduc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will seriously undermine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slowdown will also cause a huge loss of social elites. There are two way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growth slowdown: first, transform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by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to prevent a "hard landing", and secondly, promote social reform to strengthen social stability and reduce the dependence of the society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growth accounting; growth dependency syndrome;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social reform